

#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洪霞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 序 言

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犹如一片广袤而深邃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漫步，可以一路欣赏草坪上的绿草如茵，花丛中缤纷云锦，远处的葱郁林海，以及森茂阜岗等；但终究由于它是广袤的，因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尽揽胜景于眼底。看来，烂漫之游，亦需遐想和近凝，只有仔细观察和体验，才能臻于情景交融。

这个比喻，用来说明本书虽然亦尽力之所及，反映和再现了近代金融领域中一些重要金融机构、重大金融事件和金融巨擘，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感不足的情况，也许是颇为恰切的。

正由于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漫步式的，所以在本书的体例和结构上，也不受求全、求系统化等程式的拘束，而有较大的灵活处理的余地。

本书由19篇文稿组成，按照类型和年代，作了粗放的排列。除第一篇《百年变迁话金融》系百年史的综合概述外，其余18篇都是某一方面的专题。由于它们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每一篇有各自详尽的叙述，单独地刻划一个事物，合起来也大体上构成百年金融史的轮廓，使人有总体印象。19篇中，有几篇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撰写和发表过的，为了存真，这次仅在用词上作了一些订正，不作大的改动。

历史是一条长河。读点历史，尤其是读点近代金融史，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情况、认识事物，“鉴往知来”，提高金融科

学的理论水平。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金融史的近代部分多作探索，尽管它是使人莫测涯畔的特大园地，然而漫步的人多了，必将增进和最终达到对它的全貌的认识。

在写作和成书过程中，荣幸地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专家汪敬虞同志的指教，获得了单位领导的关注，研究所许多同事的协助，尤其是《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两文合作者张继凤同志的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至于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和编辑同志对本书内容的匡正和纠偏，使本书减少缺点，其可感佩之处，自不待在此赘言了。

作 者

1989年2月，

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

## 目 录

### 序 言

- 第一篇 百年变迁话金融…………… ( 1 )
- 第二篇 略论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  
和历史地位…………… ( 35 )
- 第三篇 上海钱庄的产生、发展与改造…………… ( 45 )
- 第四篇 19世纪在上海的外国银行…………… ( 61 )
- 第五篇 从汇丰银行看西方列强对旧中国  
的金融统治…………… ( 90 )
- 第六篇 论洋务派的金融活动…………… ( 116 )
- 第七篇 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  
形成及其完整形态…………… ( 132 )
- 第八篇 清末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 151 )
- 第九篇 “南三行”之首——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的创立与发展…………… ( 165 )
- 第十篇 “北四行”支柱——金城银行的资金来源

|      |                              |         |
|------|------------------------------|---------|
|      | 和资金运用.....                   | ( 186 ) |
| 第十一篇 | 北洋政府命令停兑和上海中国银行<br>反对停兑..... | ( 206 ) |
| 第十二篇 | “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        | ( 217 ) |
| 第十三篇 |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                | ( 248 ) |
| 第十四篇 | 旧中国的中央银行.....                | ( 275 ) |
| 第十五篇 | 四大家族与金融.....                 | ( 294 ) |
| 第十六篇 |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 ( 314 ) |
| 第十七篇 | 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形成.....             | ( 328 ) |
| 第十八篇 | 近代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             | ( 348 ) |
| 第十九篇 | 金融业资产阶级发展的五个阶段.....          | ( 377 ) |

# 第一篇 百年变迁话金融

## 一、变迁的开端

近代中国金融的变迁是复杂的。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经历了漫长的100年时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那时基本上是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主要斗争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鸦片战争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并且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金融领域里的情况亦正是如此。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银行，只有钱庄和票号，以及从事消费信贷的典当，鸦片战争后不久，英国的丽如银行就于1845年在香港设立分行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1847年就在被称为“北华”的上海设立一个代理处。<sup>①</sup>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早发达起来的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1820年占了世界工业总产额的一半，随着工业的高涨，规模日益巨大的企业投资已非单个资本家所能承担，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就产生了。这种股份企业在金融业中发展也十分迅速。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斯在321家私人银行之外，已有115家股份银行。<sup>②</sup>这种股份银行的潮流，也从西方涌向东方。继丽如银行进入中国之后，50年代又有汇隆、阿加刺、有利、麦加利四家英商银行来华设行。60年代初又有四家英商银行在中国大地

① 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向其政府所作的上海贸易报告的附件。载《英国蓝皮书》第40卷，《近代上海大事记》。商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②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上“昙花一现”并有第一家法国银行法兰西银行的设立，而那个后来居上、业务发展十分迅速、成为长期居于旧中国金融垄断地位的汇丰银行亦于1865年在香港成立总行和在上海设立分行。<sup>①</sup>

## 二、战争的影响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从1851年1月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到1864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南京陷落，先后达14年。在这14年中，农民革命战争的烽火猛烈地冲击着清朝统治，也对社会经济和金融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上海的钱庄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1853年太平军沿长江东进，三月破南京城，并以南京为天京，随后又渡江发动北伐与西征。声势所及，附近一些省份的官僚、地主、商人纷纷移居到上海租界上来，上海租界开始由单一的外国人居住变为华洋杂居的特殊区域。那些拥有资财的江浙等地的富绅、巨贾不仅把钱存入钱庄，而且还投资于钱庄，另一方面在洋行担任买办的杨坊、唐廷枢、徐润等人深感贸易需要金融周转，也在五十年代设立钱庄。这些都促进了钱庄业的大发展。1858年上海有大小钱庄100家以上，<sup>②</sup>其中较大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的便利。由于战争的影响，原来势均力敌的南市与北市钱庄业，这时候重心逐渐移到租界上的北市。

其次，对另一类金融机构票号的影响和引起的变化也是巨大的。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消息传来，北京金融市场立即出

① (英)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和第23页。

② 英商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1858年6月12日。

现剧烈动荡，“阖城钱铺于二月初同日关闭”，“在京富商俱提本还乡”，其中很多是拥有巨资的山西票号商人。当时北京调度资金，“内外所以无滞，全赖汇局（即票号）为流通银钱”。江南战火蔓延后，“汇兑既已不行，靡肆自形萧条”。可见金融一受阻滞，各业均受影响。在上海，鸦片战争前没有一家票号的分号，这时受战争影响，远在山西的号东就部署汉口、苏州等地的分号，或收缩，或把资金移向上海的租界。到1883年，上海已有规模宏大的票号24家，① 资力均较雄厚，对钱庄拆款的总额可达到二、三百万两。对票号关系重大的另一变化，是清朝政府放宽了各省解缴朝廷的“京饷”只准运现不准汇兑的禁令。由于战区扩大，交通阻塞，运现解缴的“京饷”越来越少，预计可收700万两却只能收到1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于1862年冬通令各省总督和巡抚，可将京饷觅殷实银号（票号）“设法汇兑，”。票号从此有了承汇公款的汇款来源，而且越到后来汇款的金额与规模越大。

票号与钱庄的相互为用，一是票号以余款拆借给钱庄，使钱庄扩大了与商人和商业的联系；二是它们运用各自的信用工具和特点，使埠际间的商品交换毋须搬运现金，可以凭借汇票和庄票进行沟通，完成异地的结算与清算。

再次，战争对清政府财政的影响使财政收入锐减，支出大为增加。除了加税，就是滥发通货，包括制铜、铁大钱，滥发银票、宝钞。封建统治者把这种勾当视作“生财经常之至计”，可“操不润之财源”。这种大大超过商品流通需要的滥铸劣质大钱、滥发银票与宝钞的行动持续了十多年。据统计，1853—1861年间共发行约合银6029万两，② 为国库收入8667万两的69.5%，成

① 《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

②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为弥补国库收支赤字的最大来源。

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币制金融的极度混乱，引起物价、粮价的不断上涨。1853年，银一两换京钱不过4000文，到1861年竟达3万文。大钱、票钞的发行集中在京城北京。北京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粮食、杂货均赖外地运入。币制一混乱，农户运农产品进城，换回大钱，到本地不便使用，就不愿搞这种贩运。外地商人运货到京，售得的大钱，需要七、八千文才能换银一两，<sup>①</sup>而京城外面不过三、四千文，商人亏折甚巨，从此裹足不前。货物不能源源而来，势必造成京城百物昂贵。麦面一斤，京城以外的乡镇售价不过制钱十六、七文，而城内则需三十七、八文，“一城之隔，价值倍增”。币制混乱，商品缺乏，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下层社会居民的生计，也给小生产者带来困难和不利。

### 三、1883年风潮

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使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的市场受其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运不得不受其摆布。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逐年增加。70年代下半期，每年入超尚只有几百万两，1881年达2045万两。还由于金、银比价变化，世界银价下跌，每一海关两同英镑的兑换率逐年下降，金、银之间比率的变化，对用银国的中国来说，货币贬值并不能带来出口增加，相反，却是要用比过去更多的物资去换回一个英镑。

在外国资本压迫下，中国经济一年比一年衰落，《申报》在1883年10月时曾著文加以描述：“自光绪丙子（1876年）以来，七、八年间空气大坏，丝茶两项之外，他业均平常，……因是市

---

① 清代钞档：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萧浚兰奏。

面萧索，大非同治年间（1862～1874）可比。”<sup>①</sup>但就是被认为尚可维持的丝茶两项出口大宗，其销售价却是深受洋商的操纵，富商胡光墉为了在丝价收购上与外商作一番较量，弄得自己倾家荡产，成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最大牺牲者。这次风潮是从年初一家大商号倒欠钱庄巨额款项连累钱庄而开始的，到了十一月胡光墉经营丝业失败，他所独资开设的阜康雪记钱庄倒闭，<sup>②</sup>再加中法战争的爆发已如箭在弦上，金融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一向拆款给钱庄的外国银行和以较长期限贷款给钱庄的山西票号均停止向钱庄融通资金，本来自身资金薄弱的钱庄骤失去数百万两资金来源，调度乏术，遂致竭蹶。钱庄无款可贷，商号没有周转资金，虽有物品也无处可抵借而相继倒闭，反过来又影响钱庄放款的收回，终于使大批钱庄不是搁浅倒闭，就是停业清理。这一年中，钱庄由年初的78家，到年终只剩10家，<sup>③</sup>影响所及，镇江的60家钱庄倒了45家，连远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也受到风潮的波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和金融恐慌。

钱庄常常发生集中性倒闭的原因，乃是由于钱庄的体制缺乏聚集资金和积累资本的自我要求。钱庄的最大弱点是它不能象新式银行那样从事小额存款的吸收，在经营意识上也不知道从事小额存款的吸收对于金融企业的重要性。它也不注意资本积累，每年盈利全部分配给股东，没有提取公积金和增加股本的任何规定。百数十年过去了，每家汇划钱庄的资本仍是二、三万两，至于中小型钱庄的资本那就更小了。资力不足，难以抵御大的风浪。它的授信业务，只有信用放款而不搞抵押贷款，只注重人的信用而不讲究用抵押品来保障贷款的安全，一旦发生风潮，就是一

---

① 《整顿钱业说》，《申报》，1883年10月24日。

② 《申报》，1883年12月9日。

③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大片客户倒欠款项，各钱庄之间还会发生连锁反应，使风潮越演越烈。钱庄资力不足，却竭力扩张信用，它自己的资本小，而凭借外国银行对它的拆款和票号对它的贷款，放款往往达数十万两；它不是靠吸收定期性存款来从事长期放款，而是靠随时有被收回可能的同业拆款来充作较长期放款的资金来源，这种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之间结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遇风吹草动，势必受制于人，免不了发生支付危机。

1883年金融风潮后果之一，是外国在华银行势力更加扩张，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得心应手。尤其是汇丰银行的金融势力不断扩张，到1889年止，它在中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达到14个，加上丽如银行的6个，有利银行的8个，麦加利银行的5个，合计33个<sup>①</sup>，构成了英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独霸局面。

#### 四、波澜起伏的20年

19世纪90年代之前，其他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为数不多，而且也都较为短暂。跨入90年代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国垄断资本银行到中国来设立机构的接踵而至。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仿照汇丰银行办法把总行设在中国土地上，它的上海总行在1890年初正式营业；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在华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894年和1899年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开设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初即在上海设分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稍后一步于1902年建立在上海的分行，这五家银行加上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主要银行。它们在上海设立据点后，又进一步在我国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尤以那个资本不

---

<sup>①</sup>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年表》（未刊稿）。

足、贪婪成性的华俄道胜银行最为突出，从1896年起到1904年日俄战争前的短短8年中在东北等处开设了14个分行。

这六家银行是其本国政府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有力支持者，也是这些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枢纽和据点。列强各国为攫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而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提供的几笔巨额借款，都是由这六家银行承贷的。这些国家之间，既竞争剧烈，又互相拉拢，当它们因利害关系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曾经组成过具有卡特尔性质的垄断组织——银行团。先是于1910年组成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后是1912年组成的英、法、德、美、俄、日六国银行团，再后到1913年美国退出又成为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sup>①</sup>。参加银行团的每一个国家，照例都有自己的一个代表银行。这六家银行也就是各该国财团的代表银行。

距外国资本银行在中国设立第一个分行半个世纪之后，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成立，设总行于上海。这家银行以其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和它的创办人盛宣怀的声望而为世人所瞩目。但1905年成立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所吸收的存款远比中国通商银行为多，两者相比，在1905—1911年期间前者比后者大了10多倍，个别年份大了20多倍，最高存款额达到6339万两。<sup>②</sup>与大清银行为大同小异的交通银行是1908年由清朝邮传部设立的，也是既有公股又有私股，大权由官方人士掌握，它吸收的存款和贷款余额虽不及大清银行，但也比中国通商银行大得多。户部（大清）银行能够集中这么多货币资本，这固然是跨入20世纪后社会货币财富增多的体现，也是经营借贷资本的现代银行聚集资金职能作用的发挥。

1906年设立的信成银行、1907年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1908

---

① 夏良才：《国际银行团和辛亥革命》，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88—189页。

② 大清银行清理处编：《大清银行始末记》第250页的附页。

年设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完全由私人投资设立的银行。它们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官股，也没有象中国通商银行那样由户部拨存专款。它们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当权人当时的身份也不是官僚而是资本家。可以说，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这三家银行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踏上20世纪后，中国的金融业也逐渐地（虽然是微弱地）增加了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联系。不论是银行或是钱庄对现代企业的放款逐渐增多，金融业与现代企业的联系与关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中国近代银行均以股份银行形式出现。上述这些银行都是采取股份制形式，这与英国的银行在19世纪中叶时，既有私人银行，又有股份银行，两者并存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银行业的肇始不是从票号、钱庄演变过来，而是仿照西方股份银行的模式建立起来，这与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是把西方模式成套地移植过来的情况相同。股份银行的出现，无疑是孕育金融业资产阶级的温床。

在上海资产阶级支持辛亥革命的整个行动中，金融业资产阶级起了骨干作用。一些银行资本家热心资助革命党人为起义提供巨额经费。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曾经就信成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捐输较多作过报道，说：“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四日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sup>①</sup>。可见这些银行不仅在社会上、经济上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倾向和行动。从这些银行身上，可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具有完整形态的明显痕迹，这时候，社会上不仅有职能资本家的活动，而且有了货币资本家的活动。

清末的最后几年，虽然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在中国一些地方有

---

<sup>①</sup> 《民立报》，1913年1月19日。

所发展，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民族灾难日趋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外债和赔款，不断增加捐税，大大加重了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金融风潮也接连发生。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不仅引起钱庄的大批倒闭或停业清理，连全国性的、有分支机构12处的源丰润银号和拥有24处分号的义善源票号也相继宣告倒闭<sup>①</sup>。武昌起义后，钱庄又成批停业。山西票号则根基动摇，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依附于清政府权势的票号势必遭受致命的打击。全国性的山西票号原有26家，1913年剩18家，以后又陆续停闭14家<sup>②</sup>，除个别票号改为商业银行外，整个票号行业就此淘汰。当时本国银行也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民营的四明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信成三家银行公议停业七天，由于钱庄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营银行又停业七天，人心益形惶迫。信成银行则因替辛亥革命的民军和秘密活动提供了数十万元巨额经费，在金融紧迫之际周转失灵，难以支持而停业。那个聚集资本数额最大的大清银行也随着各地的光复而先后陆续停业，开始清理了<sup>③</sup>。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金融势力的变化是相当大的，有的兴起，有的没落，有的扩大势力范围，有的注入了新的因素，这20年间可说是波澜起伏的20年。

## 五、“黄金时期”及其他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一面筹划整顿币制，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88页。

② 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44页。

③ 《大清银行始末记》绪言。

发行各种新币、军用票，向国内外筹款以应军事需要，同时清理大清银行，建立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由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3日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的。临时政府财政总长1月24日批示：“奉大总统谕，……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大致尚属妥协，着即准行”<sup>①</sup>。2月5日，中国银行即在上海汉口路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sup>②</sup>。虽然后来中国银行商股并非大清银行商股的直接延续，4月1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另在北京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但中国银行首先是由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并在上海开业毕竟也已被载入史册。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府为筹集和拨解军饷而开办的中华实业银行，曾一度受南京临时政府的委托，发行军用钞票，“总董其事的实为孙中山先生”<sup>③</sup>。

南京临时政府，还于1912年3月拟订了《商业银行条例》。条例共14条，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展商业银行的政策，认为“商业银行之组织万不容缓”，“但银行立业首贵稳固”<sup>④</sup>，所以既要积极扶持，又需要有管理与监督。在这个条例影响下，全国银行的家数逐年增加。1897—1911年间共设立银行20家，1912年一年即成立23家，1913年又成立11家。<sup>⑤</sup>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和钱庄业也步入了迅速而又健康发展的“黄金时代”。

① 《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政府财政部事类摘要》“钱法”第107—112页。

② 《民立报》，1912年2月6日。

③ 前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6）》D第97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⑤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第63页。

从数量上看，1915～1921年的七年中，全国新设银行共达124家<sup>①</sup>，其中有著名的“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全部四家银行。

中国资本主义缺乏原始积累，真正积累起巨额资本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民族工商业普遍繁荣时期，而银行的杠杆作用，使社会货币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911年时华商银行的存款总共不过1亿元，而10年后的1921年，主要华商银行的存款总额就达到近5亿元<sup>②</sup>。

由于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繁荣，银行业务的发展十分迅速。存款固然有来源，放款也能到期收回，很少形成呆滞。银行是经营借贷资本的，“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sup>③</sup>。银行的放款，能到期收回，没有或较少遭受呆帐损失，这对银行本息基础的巩固、资本的积累、利润的增厚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银行集中社会货币资本的杠杆作用，又促使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以荣家企业集团为例，它在1915～1921年间主要通过向银行、钱庄借款，一下子就建立起申新纱厂一至四厂。

然而好景不长，西方列强从1921年起，就以更凶猛的姿态卷土重来，大量商品倾销中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外国商品的输入总额，1913年时已达到5.7亿两，但大战期间的几年中输入总额没有增加，西方几个国家减少的输入额恰好被那时竭力扩张在华势力的日本商品所填补，1918年总的输入额还是5.5亿两。可是到了1921年，输入总额猛增至9.4亿两。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① 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第63页统计。

② 前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1933年版，第298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84、385页。

对民族工业是沉重打击，中国国货工厂中的绝大部分行业又逐步地走向停滞和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中国民族工业再度陷入困境，工厂纷纷停业或缩小范围的同时，银行却仍大批设立，1922年是企业家荣德生悲叹为进入“实业界第三次风险”的年头，而这一年新设的银行仍达36家，1923年又增设30家，银行的兴旺与工业的发展相脱节，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发展。以1919年至1923年五年中设立的110家银行为例，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还存在的只有33家，淘汰了近3/4<sup>①</sup>，这种大批倒闭的现象，正是银行业畸形发展的结果。

当时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尽管在1916年发生过风潮，但存款也还是增加。1913~1922年中国银行的存款由1800万元增至18698万元，交通银行的存款亦由3542万元增至11151万元<sup>②</sup>，两家存款合计近3亿元，只不过它们的存款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为北洋政府财政垫款。这两个庞然大物，世称“中、交”，虽遇风浪而不倒；当1916年北洋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强制这两家银行停止兑现付现时，以上海中国银行为首的南方一些分行对之加以抵制、反对，拒不执行，从此赢得了社会上的加倍信任，各类存款和货币发行均大大增加。而北方遵令停兑的分行，则由于所发行的钞票迟迟不能兑现，发生“京钞”折扣使用的怪现象。由于这两家银行的当权人物有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意图，竭力扩大商股比重，到1923年时中国银行官股只占全部股份的10/40，交通银行官股也只占1/10<sup>③</sup>。

1925年发生的“五卅”反帝革命斗争给华商银行带来一线生机。这一由上海工人首先掀起的反帝怒潮，很快就扩大到全国许多重要城市。上海工人、学生、店员的罢工、罢课、罢市持续了

① 《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第3页。

② 各该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资产负债表。

③ 分别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档案。